

村落中的「国家」

——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TS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THE THIRD SECTOR

李书磊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HOUSE 浙江人民出版社



526552

526552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THE THIRD SECTOR

村落中的「国家」

——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李书磊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PEOPLES PUBLISHING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李书磊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10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徐永光主编)
ISBN 7-213-01948-1

I . 村… II . 李… III . ①农村学校 - 小学 - 中国 - 调查报告 ②乡村教育:学校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 C6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703 号

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村落中的“国家”
——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

李书磊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蔡颖春 丁睿娟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校对 张振华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天电脑信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5 万 插 页 5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948-1/G · 554
定 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徐永光

—

邓小平发动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 20 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清晰，剩下的主要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还相当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运行。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科学把社会组织分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学术界把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称为“第三部门”。因此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具体地说就是非

2 村落中的“国家”

DAN/23

营利组织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成为今日中国学术界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二

经过 10 年发展,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青基会不应该居功自傲,更不应该止步不前,我们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向着更高的目标义无反顾地挺进。10 年来,我们得到了社会的特殊关爱,因此也就要以十分出色的业绩回报社会,这是中国青基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非营利组织,中国青基会有责任通过自觉的、超前性的研究、探索、试验、示范,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增进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福祉。为此,中国青基会第三届理事会于 1998 年初成立了以康晓光为主任的“基金會发展研究委员会”,希望通过该委员会组织和实施学术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活动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实现理事会确定的组织目标,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聘请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公益机构领导人担任委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青基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的组成既体现了价值观的多元性,又体现了学科的代表性。

三

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以及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进入 90 年代以后,转型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更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同样,“第三部门研究”也成为 90 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我们设立“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的初衷,是考察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道路,研究相关的大政政策和法律建设问题,并借此推动第三部门乃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健康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第三部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际发展经验,同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际发展经验。我们坚信,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分享人类的科学成果,进而有效地促进世界各国第三部门的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委员会把“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作为 1998—1999 年度工作的重点。经过反复论证、筛选,最终确定了 10 个研究课题。它覆盖了与第三部门有关的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募捐、资助、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法律环境、文化功能、效益评估、转型期发展模式、发展历史、国际比较等方面。委员会邀请了国内外第一流的学者担任课题主持人,对各个课题主持人提交的研究方案进行了严格论证,并与各个课题主持人签订了课题委托合同。经过委员会与各位课题主持人近两年的通力合作,研究计划得以如期完成。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 10 部专著就是这项研究活动的成果。这些专著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切入,对中国第三部门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

4 村落中的“国家”

上,都通过田野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都综合运用了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最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且进行了必要的国际比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专著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我相信,这10部专著的出版将把中国第三部门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也必将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尽管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集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为开展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一个第三部门的发展实践远远超前于理论研究的国度里,第三部门理论研究更具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有志于这一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我们将广泛吸收各个学科、各个流派的高水平的学者参与研究活动,并对课题实行高效率的管理,以确保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我们将继续奉行“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原则,摒弃门户之见,吸收各派学者,形成海纳百川之势。

五

和中国青基会以往的一切工作一样,本项研究的成功也是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青基会向一切关心和支持本项研究的人士和机构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精心组织了这项研究活动。感谢各位课题主持人及作者积极合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按时提交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对丛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在杨仁山社长、楼贤俊总编辑的亲自领导下,第二编辑室的全体同仁及各相关科室的同志们尽心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这套精美的丛书,为本项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还有许多人士和机构为本项研究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然而,我却没能在此一一向你们表达谢意。但是我相信,只要这套丛书能够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有所贡献,你们就会原谅我的失礼,因为对于你们来说,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富裕的伟大事业相比,我的一句感谢是微不足道的!

1999年8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村落中的“国家”.....	(1)
第二章 教师们	(15)
第三章 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上)	(39)
第四章 课堂上的文化传承(下)	(76)
第五章 教育循环.....	(118)
第六章 一种比较.....	(172)
参考文献.....	(193)

第一章 村落中的“国家”

在胡麻营乡，只有一个单位挂着县里的牌子，那就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通常被简称为“丰宁希望小学”或“丰宁小学”）。1991年，希望工程的信息传到了这个虽然不“远”但却有点“偏”的县份，据说是县领导去市里和团省委“跑”来了这所小学。丰宁县县域8765平方公里，面积可以敌得上欧洲一个小国了，但却是国家级贫困县。1990年全县财政收入才1746.6万元，虽说比1952年增长了105.56倍^①，然而比起发达地区的县财政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这是典型的“吃饭财政”，靠这点钱是办不了什么事的，要办事办学还得到外面去找钱。中国北方像这样的县有一大批，它们因为条件所限一时还搞不了“外向型经济”，就只能努力去搞“外向型财政”，向中央与发达地方争取援助，“‘跑’部（步）进京”。要认真地算起账来，中央与发达地方对它们是有所负欠的，因为正是它们无偿或极其廉价地提供了生态与矿产资源。丰宁有辽阔的坝上草原，有金、银、铁、铂等矿

^① 丰宁满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丰宁满族自治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2 村落中的“国家”

产。它对北方的两个大城市北京与天津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北京饮水河的潮河就起源于丰宁县黄旗镇的哈拉海湾村，而被称为天津生命线的滦河也源于丰宁，且由丰宁的另一条河牤牛河注水增流。不过，长期以来，除了中央财政提供的扶贫无息贷款，北京市与天津市并没有给丰宁什么经济回馈，丰宁人还得自己到外面去一点一滴地求钱，建厂、修路、办学校。直到后来丰宁县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结成了扶贫对子，情况才有较大的改观。国家计委在短短四年内(1996—1999年)就为丰宁建起了19所希望小学，每所投资从15万到80万元人民币不等；而在1991年，能破天荒地“跑”来35万元办一所小学已经使县里的官员欣喜有加了。校址选在了胡麻营乡的胡麻营村，这座离县城还有30公里的村级小学被破例地冠以县名，仿佛是县里的直属机构。至1999年6月，各地(包括本县)的单位与个人在丰宁援建的希望学校总共已达53所，胡麻营村的这一所远不是最大、最漂亮的，但一有人来丰宁参观希望小学，县委办公室还是径直地把人带到那里，充分显示了对这“第一个”的珍惜与喜爱。

我于1999年6月23日来到丰宁县城。尽管这是一个贫困山区，尽管属于满族自治地方，但丰宁作为国家政权建制的一部分与中国任何一个县份都没有二致。“六大班子”，部局委办，公检法司，一应俱全。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里国家的“痕迹”更重一些，因为这个县驻有大量的军队。从60年代开始，中国与前苏联交恶，这里是中苏假想战争中的前线，军队就驻下来了。县城的主要街道上有军队的大院，院墙上大书着标准化的军队标语；就连县宾馆主楼门厅的迎面墙上都挂着军队庆贺自治县成立10周年的大幅。晚上在街上散步可以反复地看到“绿化丰宁、护卫京津”的灯箱广告，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这里对首都、对国家政治中心的认同与从属态度。丰宁县城名曰大阁，它

距北京城 188 公里,多为山路,这个距离公共汽车需行驶 5 个小时,小轿车需 3 个小时。5 小时是老百姓的距离,3 小时是官员的距离,但无论老百姓还是官员都夸奖说公路修得很好。这段公路虽然不宽阔且多盘旋,但修得精致,养护得精心,路面平整而光洁,路边有“样板路”的标志,可以保证国家的统治中心与这个深山县份无交通障碍。将这个县紧密地纳入国家统治系统的还有通信与传媒,长途直拨电话与卫星电视已经开始普及。作为河北省一个邻近北京的县份,它受到来自省会与首都的双重的政治辐射。

丰宁县的教育网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开的。全县现有小学 284 所,初中 32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3 所,普通高中 3 所,各类在校学生 63361 人,教职工 3821 人。^① 高中办在县城与两个较繁华的镇子,而全县每个乡镇都至少(对于大部分乡镇来说,也是最多)有一所初中,称为“乡中”或“镇中”。小学直接办在村里,自然就是“村小”了。高中、初中、小学三级学制基本上与县、乡(镇)、村三级政制相平行。就政制来说,县、乡属于“人民政府”建制,是国家机构,其领导与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干部;而村却属于村民自治区域,村民委员会主任与党支部书记都是农民,不在国家干部序列。学校建制则高、初、小三级都属于国家。虽说有“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说法,村小应该从属于村里了,但实际上,村小的校长都由国家机构任免,都是国家干部,且学制、课程与教材都由国家教育部颁发。村里只负责修建校舍、购置桌凳,对人事、教学与日常管理则没有权力。就丰宁来讲,县设教育局,乡镇设中心学校;中心校并不是一个学校实体,而是乡

^① 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局:《教育工作汇报》(打印件),1999 年 5 月 15 日,第 1 页。

4 村落中的“国家”

镇级教育行政机构，中心校校长属行政副科级，由县教育局任命，管理一乡之内的学校。中心校负责任免小学校长（乡中校长则由县教育局任免）、调动教师、监督教学。几个乡的中心校组成一个学区，学区设总校；但学区与总校并不是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而是为了方便而形成的工作组合，没有真正的行政职能，总校校长由总校所在乡镇的中心校校长兼任，与其他乡镇中心校的校长平级。实际上各乡镇的中心校直接隶属于县教育局。

丰宁满族自治县还做到了一件中国许多县份都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全县所有正式教师的工资都由县财政支出，县教育局发放。90年代初中国各省推行了县乡财政“分灶吃饭”的改革，乡以下公教人员的工资都由乡里自筹；乡财政的状况自然逊于县里，所以乡里的公教人员工资较县里被更多地拖欠。丰宁县也实行了“分灶吃饭”，但只“分”公务员不“分”教师，使教师的工资获得了保障，也更加凸显了教师的国家身份。再具体到胡麻营乡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希望小学，它现有的11名教师全部是正式教师。正式教师即是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教师，在地方上俗称为“国家教师”或“公办教师”，区别于民办教师与代课教师。民办教师（简称“民师”）在70年代曾是县以下教师队伍的主体：丰宁县1971年有专任教师1900人，其中民办教师1042人；1979年专任教师3597人，其中民办教师2422人。^①80年代以后民办教师逐渐减少，至1990年，全县2667名专任教师中民师仅占329名。^②到了今天，据说全县的民师只剩下3名了。民师的减少除了年纪大自然退职的原因之外，也因为政府曾经有计划地、大规模地通过考试与师范学校的正规培训将民师转成公办教师，称

^{① ②} 丰宁满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丰宁满族自治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983—984页。

为“转正”。代课教师是在公办教师不够用、民师停招的情况下非正式招雇的教师，属临时工性质，数量不大，多任教于偏远地方的小学，而且今年县教育局根据上级指示已制订了两三年内全部辞退代课教师的计划，因为越来越多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分配回县，不用再为师源发愁了。到那时，乡村学校的师资将是清一色的国家教师结构，丰宁小学现在的师资结构乃是一种先声。

从组织与职能来看，小学就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这正吻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路易斯·奥尔萨瑟“学校是一种国家机器”的判定。^① 小学还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它与乡村的互动就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从这些角度观察丰宁希望小学是颇有意思的。

丰宁希望小学坐落在胡麻营行政村中一个叫北道池的自然村。北道池与村委所在地胡麻营自然村只有1公里远，两村之间有一棵数抱粗的百年老柳。原来的胡麻营村小就办在胡麻营自然村，改希望小学时要求临公路，村小就搬到了傍路的北道池，且获得了以县命名之荣。丰宁希望小学的迁至使本为三家村的北道池逐渐热闹起来，小学门口办起了“希望饭馆”、“希望商店”这些借学校名且“吃学校饭”的店铺。没过多久，居然将乡政府也吸引来了。胡麻营乡本为塔黄旗乡与后营乡合并而成，合并时为显示不偏不倚，乡名不取塔黄旗也不取后营，而采取距塔黄旗3公里之遥的大村胡麻营之名；乡名虽叫胡麻营但乡治却仍设在

^① 戴维·布莱克莱吉等：《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王波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6 村落中的“国家”

塔黄旗，直到丰宁小学落成后乡政府才迁来，算是将“胡麻营”的乡名坐实了。原来在塔黄旗的信用社也随着乡政府迁来，但信用社因为信用关系不能随便改名，仍叫“塔黄旗信用社”，赫然镌于信用社的门额之上。“胡麻营”、“北道池”、“塔黄旗”、“丰宁”这些比邻而挂的牌子真得让外来人糊涂半天。

乡政府虽寄居于胡麻营村，但自然不属于村中单位，村子是它的辖属。这个乡下辖 16 个行政村，算是丰宁较好地盘上的大乡，因而乡政府盖得有点气魄，有两层楼。胡麻营村的村小——丰宁希望小学就紧靠在乡政府的后面，乡政府楼房的后山墙就是它的前围墙，它的校门设在乡政府的右后方，有很宽的通道达于公路。小学的楼比乡政府的楼小，但院却比乡政府的院大，而且要整洁、有序得多。乡政府很家常、很天然，有点像个农家庭院，院中用矮砖墙圈起一个大园子，里面种满了茄子、黄瓜、豆角等各色菜蔬，这菜园占去了院子的大半，使这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天气很热，乡里干部下班后吃饭，有时就在办公楼前摆上一张桌子，把酒闲话，颇得乘凉之趣。乡政府没有门房，在院门侧本该是门房的位置竟是个厕所，门外过路的行人、商店与饭馆的顾客都到这里来方便，使乡长李柏丛恼火不已。有一天我看见过他在院门处闷闷不乐，东瞅西望，一问才知是他想将厕所挪个位置，“不能让人堵着门口拉屎”。厕所里没有灯，夜晚进来要以脚探路；白天进来可见微光，正好照见苍蝇及它们的幼虫，习惯了倒也并不觉得瘆人。这个厕所虽使乡政府减少了一点威严，但却使老百姓对乡政府有了几分亲切感。

相比之下，丰宁小学倒比乡政府更像一个政府。校牌仿县级机关制式以满汉文并写，颇成体统。进校门是宽阔的操场。学校的楼前红砖铺地，有少先队员擎举着星星火炬的雕塑。楼前还整整齐齐地砌着花池，栽种着盛开的十样锦，这是普及“花园式学

校”的结果。当然也有菜地与厕所，但却设在楼背后的后院里。厕所分隔成四部分：男生、女生、男教工、女教工，有别且有序。我看男生与男教工厕所里打扫得很干净，一丝不苟，没有蛆。操场上的队列，按时响起的铃声，都使人有一种军事化的组织感。围墙内侧几乎贴得不留隙地的各种标语，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闯入你的眼界，而学童们震耳的齐声朗读，更使这种话语生出声色。从操场眺望可以看见不远处的荒山，与学校比邻而显得有些凌乱的农舍，对比之下使你感到这小学就是在自然散漫的村居中人为设置的国家环境。它是国家培育人才的工厂，它自身也是国家形象的一种展现。有意思的是，由于教育系统更有效的组织手段，由于教育从业者更纯粹的信念与更严谨的行为，由于学校与村落生活的相对隔离性，使小学比这里的国家行政机构——乡政府倒更具有国家的色彩了。

教室里的张贴与布置也显出一种明确的目的性。丰宁小学一至五年级的教室都布置得很正规，墙上都贴着名人们的画像，画像上标着人物的姓名与身份，并印有他（她）的一句名言。画像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文化名人，一类是英雄模范。前一类有居里夫人、诺贝尔、鲁迅与孔子，后一类有董存瑞等。诺贝尔的头衔定为“瑞典化学家”，其名言是“生命是自然交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居里夫人：“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她的名言是“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名言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的创始人”，名言是“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董存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名言是“党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了，没有二话，天塌下来也要完成”。画像都是教育当局专门为在教室张贴设计的，其人都是让学生看齐的人生楷模，其言是让学生遵循的行为准则。我问三

8 村落中的“国家”

年级的班主任,学生问不同这些人是谁。她回答说:“不用他们问,我给他们讲,他们都知道。”在二年级的教室里,诺贝尔与董存瑞的画像并列挂在一起,一个是西方发明炸药的人,一个是中国使用炸药并为此献出生命的人,而诺贝尔偏偏又说生命是珍贵的宝石。这两个人并列在一起真是有点惊人,但他们又确确实实同是国家因为自己内在的需要而为教育设定的楷模。国家要追求现代化,就必须动员学生崇尚科学,就必须以科学文化巨人的形象为精神资源来展开英才教育,就必须鼓励学生“攀登科学高峰”,所以作为科学家也作为科学文化最高奖象征的诺贝尔必然被供奉于中国乡村小学的教室;而国家同时还要追求政治的稳定与政权的巩固,所以代表着忠诚与献身的董存瑞在教室中也不可缺席。一般来说,越是对于偏远乡村的孩子,遥远而伟大的人物就越成为被热烈崇拜的偶像,就越拥有神秘而神圣的光环,就越具有真切而强大的感召力量。

我读丰宁二中优秀教师李桂军为初中语文第三册中的课文《论“基本属实”》所写的教案,其中专门有这样一条:“(5)本文为什么能写得如此好呢?因为它的作者是吕叔湘——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① 这篇教案被作为典范收入《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志》。身为名人就可以被理解为写好文章的全部原因,偏僻的小地方对名人崇拜之偏执由此可见一斑。国家就通过村小教室中的挂像为表达并实现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浓郁的氛围,挂像起到了有力的引导与烘托的作用。而在教室中日日进行着的课程与教学同样呈现出“科学文化—思想品德”的二元结构,印证着学校作为人才工厂的国家机器

^① 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委员会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丰宁满族自治县教育志》,1991年3月内部印刷,第91页。